

◇ 日本中国文学

王晓平◎主编

白居易写讽谕诗的前前后后

〔日〕静永 健◎著

刘维治◎译



中華書局

日本中國學文庫

王晓平◎主编

白居易写讽谕诗的前前后后

〔日〕静永 健 著

刘维治 译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居易写讽谕诗的前前后后/(日)静永健著;刘维
治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7.10
(日本中国学文萃)
ISBN 978-7-101-05184-1

I. 白… II. ①静…②刘… III. 白居易(772~846) -
讽刺诗 - 文学评论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7547 号

-
- | | |
|-------|--|
| 书 名 | 白居易写讽谕诗的前前后后 |
| 著 者 | 〔日〕静永健 |
| 译 者 | 刘维治 |
| 丛 书 名 | 日本中国学文萃 |
| 责任编辑 | 梁 彦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40 千字 |
| 印 数 | 1-4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05184-1 |
| 定 价 | 22.00 元 |
-

总 序

王晓平

日本人(包括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迁徙到列岛的人们及其后裔),至少从我国南北朝时代便揭开了研读中国典籍的历史,而伴随中国文化进入日本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诸如写经抄书、创造假名、宫中讲经、发明训读、朗咏流行、设明经文章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构成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壮观的奇景。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身。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广义上讲,日本人研究中国,几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但学界真正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中国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长达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国研究史,是与日本文化的开创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抛开中国学术史,便没有完整的日本学术史可言。但是,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研究中国的方法和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尽管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与西方学术同时也与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联系,远比与中国同时学术的联系敏感、紧密而又牢固。不论如何,从古至今,日本学界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大学问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与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导这门学问的根本课题,是岛国日本如何面对大陆中国。它们不仅植根于异质的文化土壤,从属于日本文化体系,反映或者作用于当时日本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日本学界获取评价,而且根本目标在于发展日本文化。所以尽管它们有时与中国本土学问面临着同一对象,然而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价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历史阶段的今天,国外中国学与中国国学共同构成世界的学术中国观,而又各属不同的学术体系,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对于我们的国学来说,国外的中国学可以说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国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进一步说,日本中国学除了具有其他国家中国学的共性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离不开一个“近”字。例如,由于许多业已散佚的中国文献通过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为域外最重要的中国文献资料库之一;又比如日本拥有传统的阅读和训释中国文学的特殊手段等等,这给中国文献的传播和解读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中国学与日本学研究的关系特别紧密,也使得它在考据和比较研究这两方面,有着更多的资源和课题。

在日本,对日本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与对中国的研究一刀两断,再加上现代学术谋求沟通的大趋势,便使得日本中国学者,例如内藤湖南、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响超出了中国学的范围;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学的著述,例如明治



时代的民俗学家、最早的环境保护运动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识巨人”、“时代代言人”之称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劳者”称号获得者中西进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国学的部分,也都有一读的价值。

日本近代以来在某些研究条件或手段上不同于中国本土,日本学人多重实闻亲见,不尚空谈,长于细读深究。他们在某些领域,例如中国宗教文化、敦煌文学、中外关系史、艺术史以及中国戏曲小说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给中国学人以启迪。日本从奈良、平安时代起逐渐形成一些接受中国文学的热点,如《文选》、《白氏文集》、《唐诗选》、《古文真宝》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成果,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互补互鉴的作用。这些都使得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报以热眼。学人多以“他山之石”、“邻壁之光”来强调这种关注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又从很早便有了对盲目追随日本学人态度的批评。早年章太炎先生对这种态度给予的辛辣讽刺,虽不免言之有偏,却仍不失警戒之功。前辈学者对于当年那些所谓“支那通”的揭露,更不该忘记。在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展开系统研究的时候,仍有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与人云亦云现象,强调中国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统一,葆有学术自信和识别眼力。

今天,更要看透那些变样翻炒“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所谓“中国通”,他们往往将历史和现实作短线连接,凭借现代媒体和出版业,朝论夕改,张大偏见,仅就学术手法而言,也实不足为训。应该说,这些人虽然不是日本中国学界的主流,但是他们头上也顶着“大牌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和“社会名流”的帽子,近



年来忙不迭煽乎所谓“厌中”(讨厌中国)情感,就很有些拉着舆论走的能量。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对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价值,绝不止于“借鉴”,也不应该停留在“此优彼劣”的结论上。对日本来说,日本中国学是日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某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中日关系。日本的知识界,往往通过它们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专家们,以及有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的思想者写的关于中国的著述,对短期或者较长期的社会思潮,有时甚至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起过某种作用。言说中国的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及民间话语等共同营造着中国形象,而其中学术话语的影响则更为长久深远。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学人来说,通过这些著作来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人、解读日本人的中国观,或许也不失为一条途径。同时,我们对日本社会文化看得越透彻,就可能对日本中国学研究得更为深入。

总之,在中日文化双方不能不互相正视的今天,对待格外重视师承流派、沉淀深厚、做派繁复、多变多样的日本中国学来说,草草一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原始察终,辨源析流,叩同问异,进而学会平等地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既是对话,那当然不是只“知己”就行了,还必须“知彼”,而且不是一般的“知”,而是要深知熟稔。所幸我们已经有了《日本中国学史》、《日本汉学史》等专门的著述,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中国学乃至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到今天,在人们对吸收外来文化倾注着空前热情的时代,面对别种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显出更大的必要性。这种声音,不是自说自话,而要有往有复。因而,加强对国际中国学的研究,必然会与我们的“中国学”走向世界相联系。在这一方面,日本学界可谓先行一步。为了推进国外的日本学研究,十多年以前,日本便建立了对外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最近又在法政大学中设立了国外日本学研究基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国际日本学研究展开分析。以此反观我国知识界的一般认识,有些人多只看到那些操着怪腔怪调汉语的外国人在该国学界没成什么大气候,又爱发些对中国隔靴搔痒的议论,就轻看国际中国学研究的意义。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工作的紧迫性。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和同时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

对于收藏在日本的中国文献,日本学者已经对文本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我国学者却常因为无法与原件谋面而深感遗憾。有些日本学者抱怨中国学者对日本存藏的中国文献抄本、刻本评价过低,而实际原因是这些资料一般中国学者很难看到。面对涉及各类学科的日本中国学著述,切实了解它们的最好方法无疑是阅读原著,而且是系统阅读,因为翻译有时难免会模糊两种文化的细微差异。然而,在很多有兴趣的学人还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



时候,翻译就显示着特殊的必要性。

我们选择一些篇幅不长、适于阅读的名篇名著、新人新作介绍给读者,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日本中国学的多种面孔。我们在坚持学术规范的同时,也不应排斥学术研究的个性化与多样化,这些研究和写作方法的异色,或许能帮助我们扩大眼界。

我们这套丛书,没有选择像斯波六郎所著《文选李善注所引尚书考证》,或者太田次郎所著《以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本文的研究》那样大部头的专著,它们学术价值很高而读者面很窄。这些书很重要,等条件具备,也应该译介过来。我们先要做的,是希望读者能认识一批比较好接近的客人,也就是一批学者为非中国学专业知识分子写的书。

日本一些研究中国学的名家,很重视为一般读者写书。吉川幸次郎曾提出让学问回归大众的口号,白川静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也强调在孤诣独往苦苦求索的同时,要努力使学问返回到“一般”,即回报于社会。像青木正儿等人文笔之好,在学界早有定评,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随笔脍炙人口,几十年来一直是书店的畅销书。

我们选择的书目,除了几部新人新著外,都是“大家”写的“小书”。或侧重其保留中国文献资料的价值,或侧重对中国本土研究的补阙,或侧重于对中日关系研究的历史作用,或侧重于其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取其一点,不必求全,积少成多,不拘一格,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通过这套丛书,读者便可陆续与那些久闻其名而未见其文的好友见面,共享日本中国学之景观。

序

冈村繁

“茅塞顿开”，是人们常用的熟语。这一赞辞，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我读完本书合上书页刹那间，从内心深处涌起的那种实实在在的感觉。它是近年来少有的出色的学术专著，是年轻有为的研究者倾注心血的劳作结晶，它自始至终吸引着我，不断地给我以启迪。

本书以中唐第一大诗人，对日本文学有巨大影响的白居易（772—846）的前半生文学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再具体说，本书摆脱了日本学术界传统视角，以具有浓厚时代风潮特点的儒教政治文学“讽谕诗”为中心，对白居易当时四大名作——《长恨歌》、《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琵琶引并序》的创作意图作了精辟周密的分析，并以此为线索，对各作品相互关系作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

本书由以下五部分构成：

绪论 讽谕诗概说

上编 讽谕诗成立的基础

中编 讽谕诗诸相——白氏《新乐府》及其周边

下编 讽谕诗的终结与再生



结语 中唐时期诗歌创作的多样性

下面将这五部分内容作简要介绍。

绪论《讽谕诗概说》是本书的导论部分,对白居易当时最重视而且最自负的 172 首讽谕诗的产生过程与创作背景,以及文学特色作了概括说明。指出白居易讽谕诗创作精神,原本基于《诗经》传统,继承了儒家诗歌观,白居易真正意义上的讽谕诗创作是以宪宗元和三年(808)拜受天子谏官左拾遗为契机开始的。导论还论及白居易讽谕诗创作与元和时代风潮及文学潮流之间的关系,探讨了白居易讽谕诗在当时诗坛广泛流行的客观原因,以及这些作品高超的表现技巧和心理描写等艺术特色。在我看来,所举例证繁简适宜,考证得当,富有说服力,是很好的概说。

上编《讽谕诗成立的基础》是本论部分,从不同角度论述白居易拜受左拾遗后,创作讽谕诗的必然过程,以及与讽谕诗先行之作的渊源、白居易自编诗集的构想、在前任之地的交游和诗作等。

第一章《白居易与杜甫诗句“人生七十古来稀”》,对早白居易五十年的盛唐大诗人杜甫(712—770)的有名诗句“人生七十古来稀”作精密论证,指出这一诗句并非像历来解释那样,是表现祝福长寿之意,而是表明当时官员致仕年限;进而指出,杜甫任左拾遗时诸作品乃是白居易讽谕诗的直接渊源。本章还论述了杜甫、白居易吟咏官场中真实感受的诗歌在创作上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有关白居易讽谕诗创作的最基本难题,得到确切的解释。

第二章《诗集四分类的构想》,针对白居易自编诗集时采取独特的四分类,即讽谕、闲适、感伤、杂律,论证了四者各自的意义。若考察白居易讽谕诗,对诗集四分类构想予以探讨,是不容回避的



重要课题。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对四分类的各自定义已经明白宣示,但纵观历来研究,能像本书作者那样,敏锐察觉到白氏自身所作定义与其所属实际作品之间存在矛盾并提出疑问者,能有几人?尤其是“闲适”与“感伤”两类诗群,两者定义与所属诗篇的差异,究竟在哪里?面对此难题,本书作者也给予明确的解释。

第三章《县尉时期的白居易——与王质夫的交游》,则论述了元和初,白居易 35 岁任京畿道盩厔县尉时,与无名隐逸诗人王质夫的交往情况,由此得出结论,这一时期是白居易闲适诗、感伤诗诸作品群创作的萌芽阶段,颇有新意。而其中关于王质失事迹的考证,白居易讽谕诗《新乐府》、《秦中吟》创作与盩厔县尉时期所作悲恋爱情故事《长恨歌》之间关系的考察,令人刮目相看,很有价值。

本书核心论述部分,即中编《讽谕诗诸相——白氏〈新乐府〉及其周边》,引导读者渐入佳境。

第一章《李绅、元稹的〈新题乐府〉》,通过论证指出,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之前的李绅讽谕诗《新题乐府二十首》、元稹讽谕诗《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非像历来流行说法,认为是与白居易的《新乐府》一起,从贞元二十年(804)到永贞元年(805)间,三者同在京应试备考,亲密交往团结一致所咏。实际上,李绅、元稹的《新题乐府》与白居易的《新乐府》,各自创作意图明显不同。作者对早已亡佚的李绅《新题乐府二十首》暂不置论,以现存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与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为对象,将二者作品群的诗型、押韵、表现、内容、序文、自注作一比较,通过比较,得出令人意外的结论:李绅、元稹的讽谕诗与白居易的



讽谕诗是基于完全不同的创作意图的作品群。考证出元稹《新题乐府十二首》的创作时期,是从宪宗元和三年(808)十二月至翌年(809)二月,仅一个月时间,其有力的根据是,当时无官无位的李绅和元稹的讽谕诗《新题乐府》,很可能是为向当时著名宰相裴垍求官而呈送的行卷。在这种情况下,讽谕与求官并非相互矛盾,而是表里一体。应该说,这是很有说服力的论述。读者在接受作者这有新意的见解和格外出色的考证的同时,也会有更大的期待。

那么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意图又是什么呢?

第二章《白居易〈新乐府〉中杨贵妃形象》,考察了元和四年(809)当时任左拾遗的白居易作为诗人的立场以及《新乐府》作品的整体性质,而关键问题则是,《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与《新乐府》诸篇的杨贵妃形象比较,前者写出了绝世美女的悲剧形象,后者则相反,是一个非道之君侧的丑恶的奸女形象,其原因究竟是什么?该书作者新论推定,《新乐府五十首》出现的杨贵妃,与《胡旋女》、《李夫人》、《上阳白发人》等诗中人物一样,都是迷惑天子、残忍邪恶的妖女形象,而在《新乐府》之前为地方官时所作的名篇《长恨歌》中杨贵妃形象,则相反,是一个爱慕天子的悲剧女主人公。白居易在创作《新乐府》涉及杨贵妃时,必须与宪宗当时的庙堂舆论保持一致,同时,荣耀进身于天子近侧的白居易,自身也惊愕以前所作《长恨歌》意外大流行,担心危及自身政治生命,便一改前作《长恨歌》对庙堂政治的批判,而采取适合自己作为天子近臣身份的正面的意见主张。

作者为强调《新乐府五十首》是体现当时庙堂意向的作品群,特别指出其数目为“五十首”,以及作于“元和四年”这两点,推定



元和四年白居易创作这一作品群时,是受那一年宪宗敕命制作题为《前代君臣事迹五十条》屏风的触动而为。这种说法,确实是引人注目新见。

作者认为包含《新乐府》在内的一连串讽谕诗,与前此地方官任上轻松而作的《长恨歌》等全然不同,是受翰林学士、左拾遗这一职务很大制约的作品群。

作者还认为,从白居易创作态度的根本方面看,在某种意义上说,先前《长恨歌》中所吟咏的美女杨贵妃,在其后的《新乐府》中作为“上阳宫的白发宫女”再生,仍然鲜活地存在于白居易诗歌中;也就是说,《长恨歌》所咏玄宗与杨贵妃悲剧与先前《新丰折臂翁》和《卖炭翁》诗中老翁们的悲剧同样,都体现了诗人白居易“对数奇命运的共鸣感”^①这一基本创作态度。我对作者这一前所未见的新鲜的“讽谕诗”观,颇有认同感。

第三章《白居易〈新乐府〉的创作态度》,通过对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与至交元稹先行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在艺术表现、思想内容方面的比较,探讨了白居易《新乐府》创作态度的独特性。以元、白两人《新乐府》作品群中的长篇《传戎人》为例,就这一同题两首作品详细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绝非李绅和元稹先行作品内容原样照搬,对这些先行之作,白居易挑战性地坚持自己的“对数奇命运的共鸣感”主张,重新建构,润色制作,给人印象更深,诗情更丰富。

① 数奇——语出《史记·李将军列传》,“以为李广……数奇”,意为运气不好。李广一生战功显赫,未得封侯,后自杀身亡,其坎坷命运深为后人叹惋,常引发怀才不遇文人的共鸣。——译者注



另外,作者还从更广泛的角度探讨白居易诗作《传戎人》的背景,指出白氏至交张籍(766—830)有《没蕃人》、《征妇怨》、《关山月》、《将军行》、《陇头行》等诗作,吟咏与吐蕃战斗而生死不明的人,当时里巷间还广为流传的各种吟咏后汉蔡琰故事^①的诗歌,这些论考都显示了作者慧眼与学识。

第四章《讽谕诗的读者层——〈秦中吟〉与〈新乐府〉》,从白居易在元和四年到五年间几乎同时而作讽谕诗作品群,即《秦中吟十首》与《新乐府五十首》所设定的读者层这一视角,探究了这两作品群创作态度的不同。据作者考证,当时对这两作品群的评价,仅重视十首《秦中吟》,而五十首《新乐府》却受到冷遇。这一评价落差,缘于两作品群的创作动机异质。比较两者创作态度,《秦中吟十首》具有浓厚的为私的性格特征,设定周围友人们为第一读者,其中所咏人物几乎全是史无其名的士人,其吟咏的视角也是站在敌视富贵的一般士大夫和庶民立场,责骂权要,攻击富豪,锋芒毕露。与这一情况相反,《新乐府五十首》具有为公的性格特征,具有向天子奏闻的意识。作者这一新视角,对中唐时期兴盛的社会讽刺作品群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

下编《讽谕诗的终结与再生》,为论述方便,分第一章《左迁江州与讽谕诗》、第二章《白居易与李白墓》、第三章《〈琵琶引〉的成立》三部分。其论述要旨大约如下,即白居易元和十年(815)自撰《诗集》十五卷时,将最重要的作品群,讽刺社会不合理的“讽谕诗”置于卷头第一卷和第四卷,在其后元和十一年(816)秋,在江

① 蔡琰——汉末女诗人,字文姬。汉末大乱,居匈奴十二载,后被曹操赎回。有《悲愤诗》等述其悲惨遭遇,甚为感人。——译者注



州近郊湓浦为琵琶女所弹琵琶音吸引,由对其女“数奇命运”的共鸣感,引发自身迁谪感慨而作歌行《琵琶引》,可以说,这首诗在某种意义就是因左迁江州而创作的新的讽谕诗。作者的这一推断,可谓洞见机杼。

不仅如此,在第三章第三节《白居易的〈诗集〉十五卷》中,作者试图恢复白居易最初自撰诗集的面貌,认为《诗集》十五卷完成后直至《白氏长庆集》五十卷诗篇中的二十卷,其间曾有增删过程;认为《长恨歌》原本不属感伤诗,而属杂律诗。这些见解对今后白居易研究的深入都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

以上拙见,是我在读完本书后,对各篇章的粗浅读后感。本书充满富有启发的新见,论证坚实厚重,而且颇有文采,充分展现了作者的学养和才华。所以在我主持下已刊行的十三册《白氏文集》译注第一册(讽谕诗)的译注稿,我特地委托该书作者来担当。

不管怎样,白居易以及《白氏文集》的研究,由于作者这一部《白居易写讽谕诗的前前后后》,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期待读者诸贤的熟读精思。

1999年12月1日

目 录

序	冈村繁 1
---------	-------

绪论 讽谕诗概说	1
一、堂堂正正自信的系列之作	1
二、《诗经》的传统	4
三、左拾遗职务	6
四、元和时期的时代风潮	9
五、纯粹社会讽刺	12
六、出色的心理描写	15

上编 讽谕诗成立的基础

第一章 白居易与杜甫诗句“人生七十古来稀”	21
一、对杜甫诗句“人生七十古来稀”	